

# 胡風文藝思想批判 論文彙集

三 集

作 家 出 版 社

# 胡風文藝思想批判論文彙集

三 集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胡風文藝思想批判

論文彙集

三集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審判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牌樓胡同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219) 紙數：158千

開本33.5"×46" 1/32 印張 6 $\frac{7}{8}$  檢頁 2

一九五五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01—100000

定價(3)0.57元

## 目 次

我們必須戰鬥.....周揚(一)

胡風先生的立場是什麼.....周姬昌(二三)

我們必須和胡風的文藝思想劃清界限.....鮑昌(三三)

背後的射擊.....天藍(哭)

分清是非，劃清界限！.....姚文元(丟)

胡風先生及其小集團曾經怎樣鬥爭過？.....王智亮(六三)

阿壠的『馬克思主義追求』.....王速(七〇)

批判胡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文藝思想.....蔡儀(十六)

從胡風的創作看他的理論的破產.....袁水拍(100)

胡風的歧路.....黃源(二三)

箭頭指向哪裏？.....田間(三三)

反馬克思主義的胡風文藝思想.....舒蕪(四七)

談胡風先生的「五把刀子」

黃秋雲（六至）

不能按照胡風的「面貌」來改造我們的文藝運動……王瑞（一七八）  
從報刊工作的角度揭露胡風的「文學運動的方式」的實質……李龍牧（一八三）  
「宗派主義」在那裏？……羅蓀（一九一）  
真實的意圖在那裏？……何爲（二〇至）

# 我們必須戰鬥

周揚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上的發言

我們正在進行的對俞平伯在『紅樓夢研究』及其他著作中所表現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觀點的鬥爭，是又一次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嚴重鬥爭，同時也是反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可恥的投降主義的鬥爭。郭沫若同志在十一月九日發表的談話中關於這次鬥爭的目標、任務和意義作了精確的說明，這就是我們在今後鬥爭中所應遵從的方向。我們的大會已開了八次，許多同志都發表了很好的意見，我現在也說一點我的意見和看法。在這個鬥爭中，我們是不應當沉默的。

## 一 開展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

這次鬥爭使我們不能不想到三年前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第一次大規模對資產階級思想批判的運動。

文藝上的思想傾向的鬥爭總是反映階級鬥爭的過程的。從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民主革命勝利後，我們的國家就進入了社會主義改造、即社會主義革命的新的歷史階段。對資產階級唯心論及其

在文藝上的反現實主義傾向的鬥爭就成為思想戰線上一個比以後更加迫切的嚴重的任務。

電影『武訓傳』是在開國之後不久上映的。剛剛獲得解放的人民渴望從文藝作品中看到中國人民爲了自己的解放在歷史上曾經走過一些甚麼道路，哪一條道路走對了，哪一條道路走錯了？影片在這個重大問題上給了極端錯誤的解答。它宣傳了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主義和個人苦行主義，實際就是宣傳了對封建統治者的卑躬屈節的投降主義，而對人民鬥爭的正確的歷史道路則作了不能容忍的歪曲和誣謾。

差不多在同一時候，另一部電影『清宮祕史』也帶有同樣反動的性質。這部影片雖然在全國一度上映之後就停演了，却沒有像『武訓傳』那樣受到嚴正的批判。影片誇大了改良派的變法運動的進步意義，把光緒皇帝加以理想化，而完全顛倒了和誣謾了義和團反抗外國侵略者的英勇鬥爭的歷史，給觀眾以這樣的印象，似乎外國侵略者屠殺中國人民——義和團，佔領北京，驅逐中國政府是正當的。影片表示的思想是投降外國侵略者的賣國主義的思想。

解放了的中國人民懂得，我們今天的勝利是和我們祖先的過去的鬥爭分不開的。我們十分重視中國人民革命的傳統，決不能容許資產階級學者、作家用反人民的、反愛國主義的觀點來歪曲和抹殺這個傳統。

假如說電影『武訓傳』的批評關涉到如何正確地對待中國人民的革命傳統的問題，那麼，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就關涉到如何正確地對待中國人民的文化遺產的問題。我們要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文學藝術，就必須對於我們民族的文學藝術遺產給以正確的評價，接受其中一切有

用的、優良的傳統，在新的基礎上加以發展。批判地接受舊的遺產，這就是我們建設新的文化的出發點。因此，我們決不能容忍資產階級學者、作家用唯心論的觀點來曲解和貶低我們祖國文學遺產的真正價值以及對這些遺產採取誹謗的虛無主義的立場。

「紅樓夢」是我國最優秀的文學遺產之一。從它刊行之日起，它就引起了廣大讀者的注意和喜愛。「開談不說『紅樓夢』，縱讀詩書也枉然！」可見其風行之盛。兩百年來，對於『紅樓夢』的研究成爲了一門專門學問——「紅學」，決不是偶然的事情。

人們對於『紅樓夢』歷來有兩種不同的評價。封建統治者曾把它看爲『淫書』、『邪說』而嚴禁。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文人也只迷戀於它的婉轉纏綿的『豔情』的故事。但是人民和接近人民的作家却接受了這個偉大作品對封建社會的批判的意義和反抗的精神。會上，鍾敬文先生提到的清末梁啟超所編輯的『小說叢話』中，一位署名俠人的作者就對『紅樓夢』的反封建的偉大意義作了一定的評價。廣大讀者的同情則歷來都是在賈寶玉、林黛玉、晴雯、尤三姐這些人方面，而不是在賈政、薛寶釵、襲人、鳳姐那些人方面。關於林黛玉、晴雯的故事，成了民間說唱和戲曲的流行題材之一。

『五四』運動重新評價了『紅樓夢』以及『水滸』『三國』等古典作品；因爲『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白話，反對古文，這些作品就受到了廣大讀者的新的重視和推崇。但是胡適對『紅樓夢』及其它中國古典作品的研究，却是完全從美國資產階級主觀唯心論——實用主義的觀點出發的，因而也就沒有可能作出正確的真正科學的評價。首先，他對古典作品的考

證和評價，完全是爲了反對革命的目的，這已由他自己明白宣告了。其次，他對古典作品又單純地只從它的語言形式，即白話來着眼，而不注重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價值。如果他對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價值作出甚麼判斷，那幾乎是完全錯誤的。胡適在「紅樓夢」裏面所看到的只是一個富貴家庭「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趨勢，他認爲這個家庭之所以破產，僅僅是由於這個家庭的成員「講究吃喝、講究場面」「不會理財、不肯節省」。他認爲「紅樓夢」的「真價值」只是在它「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的描寫手法。可憐，這就是這個充滿銅臭的資產階級學者眼中的藝術境界！然而，胡適的思想在古典文學研究的領域內竟長期地佔有了統治的地位。

俞平伯先生是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在「紅樓夢」研究方面的一個代表者。俞平伯的考證和評價「紅樓夢」，也是有引導讀者逃避革命的政治目的的。他認爲「紅樓夢」不過是一本「感嘆自己身世」的「情場懺悔」之作，而完全抹殺它對封建社會的深刻的全面的批判的意義；他認爲作者對自己所創作的人物無所褒貶，而完全抹殺了作者對待自己人物的愛憎分明的態度，抹殺了這一點，就是取消了作者的傾向性，因而也就是取消了作品的積極意義。他在「紅樓夢」裏面所看到的，所欣賞的，是「色空」觀點，是「怨而不怒」的風格。他關於「紅樓夢」作了一些考證工作，但他的考證不是爲了在事實的基礎上對作品作全面的、歷史的、科學的考察，而是醉心於個別無關重要的細節，使讀者對作品得不到正確的完整的概念。他在說明「紅樓夢」和過去文學的繼承關係的時候，不是着重地去闡明作者的獨創性，反而是牽強附會地去推論作者的模倣性。所有這些，就必然達到貶低「紅樓夢」的客觀價值的結果，達到「紅樓夢」不可知論的結果。

胡適派買辦資產階級學者既懷着反對革命或引導人們逃避革命的政治目的，相信美國資產階級的反動的主觀唯心論哲學——實用主義，他們當然是沒有可能認識『紅樓夢』的真價的。對於他們，『紅樓夢』的確是不可知的。有的批評者指出俞平伯先生的文學見解不但是資產階級的，而且是封建的。實際上，這種封建性正是中國資產階級學者的特點。

抹殺文化遺產中一切進步的於人民有用的東西，貶低它們的價值，這也是現代世界資產階級文學學者的共同特點。這種特點，在中國又和對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盲目崇拜相結合，就形成爲對待自己民族遺產的反愛國主義的虛無主義的態度。

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解釋和研究古典文學作品，闡明它們的真正價值，就必須對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各種表現進行鬥爭。正確地繼承自己民族文化的一切優良傳統，在整個思想戰線上樹立批判的旗幟，這就是目前思想工作和文學工作中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

李希凡、藍翎兩同志對俞平伯的生氣勃勃的、戰鬥的批評，在反對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的鬥爭中起了先鋒的作用。他們用馬克思主義的武器具體地批判了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表現了一種爲我們許多年紀較大一些的作者所那麼缺乏的，然而又是那麼需要的銳氣和戰鬥精神。接着，很多作者陸續地寫了批評俞平伯的文章，俞平伯先生自己在大會上也表示了願意修正自己的錯誤觀點。這個批判，一方面爲『紅樓夢』的真正科學的、客觀的研究掃清了道路，另一方面將鬥爭的鋒芒指向了胡適的反動的哲學思想和文學思想。

一個多月來，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已經收到了這樣的效果：古典文學研究者們進

一步認識了只有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才能闡明『紅樓夢』及其他古典作品的真正意義和價值，唯心論的觀點和煩瑣的考證是只能把人引入迷途的。青年們在閱讀和理解『紅樓夢』上得到了正確的幫助，衝破了資產階級學者們所散佈的神祕主義的迷霧，唾棄了頹廢主義的欣賞趣味。同時在整個學術界開始了對胡適思想，特別是他的實用主義哲學的批判。

我們知道，實用主義（或實驗主義）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哲學家爲了反對現代唯物論，挽救垂死的資產階級而製造出來的一種反動哲學。它片面地強調主觀『經驗』，曲解『實踐』；它根本不否認外部物質世界及其客觀規律性的存在；它認爲凡是對於一個人有用的事情就是真理；引伸來說，剝削、侵略對於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有利，剝削、侵略也就是真理。這種哲學的主要企圖，就是在宣揚『經驗』『實踐』的幌子下來反對作爲人類科學最高成就和世界普遍真理的馬克思主義。胡適在一九一九年發表了一篇明目張胆地攻擊開始傳播到中國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的題名爲『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在這篇臭名昭著的文章中，就表現了他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最早的第一堅決的、不可調和的敵人。

胡適在政治上的反動，是人人皆知的。但他在學術思想上的反動性却不是人人都認識的。從『五四』以來他所長期宣傳的實用主義的哲學思想在知識界還有它的影響。中國資產階級思想的代表人物當然不只胡適一人，但他却是中國資產階級思想的最主要的、集中的代表者。他涉獵的方面包括文學、哲學、歷史、語言各個方面。而他從美國資產階級販來的唯心論實用主義哲學則是他的思想的根本。資產階級唯心論是有各式各樣表現的，它在人民和知識分子的頭腦中還佔有很大的地盤。

不能設想，不經過馬克思主義在各個具體問題上的徹底批判，唯心論思想可以自然消滅。因此，全面地、徹底地揭露和批判胡適派資產階級的唯心論，就是當前馬克思主義者十分重要的戰鬥的任務。只有經過這種批判工作，才能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學術界樹立真正領導的地位。「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這個批判運動，同時也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思想建設的運動。

要反對資產階級唯心論，我們必須首先反對在我們中間對資產階級思想的可恥的投降主義。

『文藝報』在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上，就是犯了這種投降主義的錯誤。

## 二 『文藝報』的錯誤

關於『文藝報』的錯誤，袁水拍同志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中已經作了嚴正的批評。『文藝報』的主要錯誤就是對資產階級思想容忍和投降，對馬克思主義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新生力量採取資產階級老爺式的壓制態度。幾次大會繼續揭發和批判了『文藝報』的許多錯誤和缺點，並對整個文藝工作的領導方面也提出了應有的批評。

『文藝報』的錯誤，當然不只是兩位編者的。我們放棄了對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批判和鬥爭，實際上就是對資產階級思想投降，這是我們工作中最大的錯誤。我也就是犯了這種錯誤的。幾年來，我把精力大部分放在政府文化行政工作上，這一方面的工作，我也是沒有做好的，而很少注意研究文藝思想問題和認真地閱讀作品。我和各方面作家的接觸是很不够的。對於『文藝報』這樣一個重要刊物，我一直關心很少。因此『文藝報』的錯誤，我要負嚴重的責任。我有負於黨和人民的委託。

『文藝報』主編馮雪峯同志已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檢討文章。我想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正是大家嚴正的批評，而決不是任何虛偽同情的眼淚。我們必須嚴肅地、徹底地揭發我們工作中的錯誤及找出錯誤的主要根源。

『人民日報』的文章中曾指出『文藝報』同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名人有聯系，而同馬克思主義和宣揚馬克思主義的新生力量則疏遠得很。這裏所指的聯系，當然首先是思想上的聯系，這就挖到了『文藝報』以及我們一切工作中的錯誤的根子。『文藝報』編者們的思想中嚴重地存在着資產階級的唯心論和個人主義，他們的『權威』思想和驕傲自滿情緒，就正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作風的突出的表現。他們脫離了實際鬥爭，脫離了羣衆，失去了新鮮事物的感覺，這就使他們自然而然地和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情投意合，而和新生力量就自然而然地疏遠起來，甚至對新生力量採取排斥、打擊、壓制的罪惡態度。

『文藝報』編者們身上既然存在了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作風，那麼，他們在編輯思想和實際工作中就必然要發展到違背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黨的文藝方針，違背工作中的集體領導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原則。

必須指出：『文藝報』對去年十月第二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所決定的方針，不但沒有堅決地執行，而且採取了消極的抗拒的態度。

第二次文代會提出了在文藝上和資產階級思想作鬥爭的嚴重任務，而且特別指出了目前資產階級思想侵襲的危險性。不久，黨中央宣佈了黨在國家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是我們國家和人民生活

中的重大事件。在去年十二月份『文藝報』上發表了一篇題名爲『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文學藝術的創造任務』的社論。在這篇社論中，不但沒有提出文藝工作者在總路線宣傳中的創造任務，而且也沒有提出在文藝上對資產階級思想鬥爭的任務。社論作者離開了這些具體任務而抽象地強調文藝工作者特殊的『方法』和『路線』，照社論作者的話說來，這就是『描寫人民的靈魂及其鬥爭』。無疑地，文學是有自己的特殊方法的，文學是應當描寫人的靈魂的。但問題是在，離開當前現實鬥爭的具體內容和任務而抽象地提出描寫人民的靈魂及其鬥爭，這就使人感到似乎文學作品描寫的人民的靈魂可以離開人民反對反動派殘餘、反對剝削制度、克服困難障礙而建設社會主義的實際鬥爭孤立地來表現。這樣一種創作思想，正是和唯心論一脈相通的。

第二次文代大會提出了創造正面的先進人物的形象，創造值得千百萬人倣效的性格，是當前文學創作上的最重要的任務，因爲這樣，文學的積極的改造社會的作用，作家作爲『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作用才能最充分地發揮出來。在大會前『文藝報』曾連續幾期地登載了關於創造新英雄人物的討論。但在編者們的思想中却缺少對於創造正面人物的積極要求和熱望，而熱心於利用作品中創造正面人物的缺點散佈對於創造正面人物這一任務本身的懷疑。他們錯誤地認爲要使正面人物是有血有肉的，不是概念化公式化的，就必須着重描寫人物的内心矛盾甚至人格分裂；把新人物内心生活的豐富性和意志堅定性同小市民的内心複雜性以至兩重人格混同起來，把正面人物所必須具備的先進階級的優良品質和他的個別的缺點或錯誤混同起來，甚至武斷地認爲一個人的任何缺點錯誤都是品質問題。這種思想實際上是對新社會中新人物的新品質缺乏信心的一種表現。很顯然，這種思想和

第二次文代大會的精神是沒有共同之點的。『文藝報』關於新英雄人物的討論之所以沒有能够做出結論來，不正因為這種思想上的抵觸嗎？

第二次文代大會提出了對於新的人民的文學藝術事業應當採取積極扶植和鼓勵的方針，反對了文藝批評工作中的粗暴態度。『文藝報』曾經發表過不少粗暴的『判決』式的批評，陳企霞同志就是這種批評的主要作者之一。我們的批判應該是有黨性的，對於敵對思想應當毫不容情，而對於站在人民立場的作者，即使他們有缺點錯誤，在批評他們的時候也必須採取同志式的與人為善的態度。粗暴批評打不倒敵人，却很容易地打傷自己和朋友，扼殺新生力量。在第二次文代大會以後，批評的粗暴作風似乎是稍稍斂跡了，但『文藝報』編者並沒有真正從思想上解決問題，他們只是採取了消極抵抗的態度，特別是陳企霞同志，從那時以來就表現了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是不可容許的消極態度，同時一有機會，粗暴批評仍然會『脫穎而出』地表現出來。今年一月間『文藝報』上李琮對於李準的『不能走那一條路』的批評就是一個例子。

在對『文藝報』的批評中，黨特別指摘了對新生力量的資產階級貴族老爺式的壓制態度，這是值得我們十分重視和警惕的。幾年來，從地方和部隊產生了不少優秀的青年的作家，他們已成為我們文藝運動的生力軍，他們是我們文藝事業的希望。李希凡、藍翎一年前還是山東大學的學生，『保衛延安』的作者杜鵬程在解放戰爭期間是西北野戰軍的記者。我們的責任就是以滿腔熱情的態度來扶植和保護我們文藝事業上的新生力量。我們愛護青年的方法當然不是一味向他們唱讚美歌，而是關心他們的發展，對他們給以具體幫助和經常向他們提出嚴格要求。嚴格要求必須與熱情

愛護相結合，這與『文藝報』經常表現的那種對於青年作者的冷酷的苛求的態度是毫無共同之點的。

『文藝報』的錯誤還由於編者們在工作上違背了集體領導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原則。編者們的『權威』思想和驕傲自滿情緒發展到了完全拒絕別人批評，也從不進行自我批評的地步。這是一條規律：凡對別人實行粗暴批評的人，對別人批評自己，即使是溫和的批評，也總是採取粗暴的壓制態度的。他們對待批評和自我批評，不是把人民和國家的利益，文藝事業發展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個人權威、友情或刊物『威信』放在第一位。

正是由於這些錯誤，『文藝報』愈來愈脫離黨的領導，同羣衆和文藝界的聯繫愈來愈疏遠，因而也就愈來愈失去了羣衆和文藝界的支特。對於『文藝報』的這些錯誤、缺點，我們過去並不是完全沒有看到，沒有察覺到的；但沒有及時地有效地加以糾正，這也是我們應負的一個嚴重的責任。

我們批評『文藝報』，並不是認爲它過去的一切都錯了。必須肯定，幾年來，『文藝報』作了不少有益於人民的工作，並且獲得了一定的成績。它宣傳了文藝爲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宣傳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對文藝作品的批評也有不少是正確的，對於青年作家也不是一概壓制的。根據大家的討論，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作出了關於『文藝報』的決議，提出了端正今後編輯方針和改組編輯機構的辦法。這是這次大會討論的一個積極的成果。我們有決心改正過去的錯誤，並認真把『文藝報』辦好。

### 三 胡風先生的觀點和我們的觀點之間的分歧

胡風先生在會上積極地發了言。我們歡迎他參加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歡迎他對『文藝報』錯誤的批評。但是從他的發言中，我們必須指出：他的許多觀點和我們的觀點是有根本的分歧的，不管是在對『紅樓夢』的評價上，在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上或是在對『文藝報』的批評上。胡風先生是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的，有些人也是這樣地看他，因此就有特別的必要來說明他和我們之間的分歧。

胡風先生在會上給了『紅樓夢』一個在他說來是很高的評價，這是一個值得歡迎的進步。我們知道胡風先生對於民族文化遺產歷來也是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的。他把『五四』以前的中國文學一律看成『封建文學』，而且在『封建文學』和『民間文學』兩者之間畫下等號。因此他認為，在過去中國文藝作品中『得不到民主主義觀點的反映』，甚至略帶有民主主義觀點底要素底反映也很難被我們發現。就是在『水滸』裏面，他也認為決沒有『發自貳心的叛逆之音』，這就是說：它也仍然不過是一部擁護封建的書罷了（見海燕書店一九五〇年三版『論民族形式問題』四七—四九頁）。在『水滸』裏面沒有聽到『叛逆之音』的胡風先生，這回，由於大家的討論，在『紅樓夢』裏面微微地聽到這種聲音了。這應當說是一個進步。但是，雖然如此，他對『紅樓夢』仍然沒有做出正確的評價。他說『紅樓夢』超出於中國以前一切文學作品的地方，就在它對於女性的態度，把女人當人、社會人來描寫，而在過去的文學作品中，女人不是『性的化身』，就是『封建道德的化